

全球智库半月谈

东盟的全球吸引力在上升

大国联姻：出现新的北京-莫斯科轴心了吗？

欧央行货币政策的国际影响

货币政策三元悖论与金融稳定三难困境

是时候放下对朝鲜的幻想了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侯书漪

刘立群

李笑然

史明睿

谢晨月

杨 茜

伊林甸甸

章珏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洋	科研助理	刘畅	科研助理
周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东盟的全球吸引力在上升 7

导读：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债向来被看作是对全球经济的威胁因素。事实上，这一论断对于一些大的新兴经济体来说这可能是正确的，如中国。但是，对于中国的邻国东盟（ASEAN）来说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由于低杠杆率及高增长率，东盟国家公司在全球的吸引力不断上升。

大国联姻：出现新的北京-莫斯科轴心了吗？ 10

导读：随着美国领导层陷入混乱，中国和俄罗斯将抢占全球领导的主动权。这两个国家有相似的政治观点、不断加强的军事合作和重叠的经济利益，但过去十年两国关系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经济发展使两国渐行渐远。两国的联姻是否可能？

聚焦中国

中国尚未准备好领导全球化 13

导读：美国放弃了其在全球化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却准确理解了自由贸易的益处，最具条件来领导全球化。但中国需调整国企改革方案，解决其国内改革不力的问题，成为全球化领导者做好准备。

中国的资本积累与收入不平等（1978-2015） 15

导读：1978年至2015年，中国从一个贫穷的欠发达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但是，在这个时期内，我们对其国内收入和财富分配如何变化了解相对较少。本文对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富水平和结构进行了第一次系统估计。国家财富收入比例由1978年的350%上升到2015年的700%，主要是由于私人财富的增加。

全球治理

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贸易与监管合作 20

导读：近几十年来，国际贸易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随着商品和服务在各国间的频繁流动，国际间监管合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了出来。今年3月，CIGI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召开了专题讨论会，就国际贸易与监管合作问题进行讨论，本文是此次会议的纪要。

经济政策

利率提升会导致财政危机吗？ 22

导读：作者认为当前全球经济虽然在复苏，但面临四大风险：（1）公共债务高企，低增长；（2）生产率下降；（3）利率升高；（4）发达经济体的民粹运动对宏观经济政策造成影响。文章认为债务高企，利率不断上升，以及低增长也许会给意大利和其它国家带来问题，但该问题是可控的。只有当这些问题遇到民粹主义时，才会真正的爆发危机。

美联储需要制定规则以避免金融动荡 24

导读：在纯法币时代里，如何维持币值稳定，保证金融市场稳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本文认为，美联储应制定基于特定规则的货币制度而非继续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

欧央行货币政策的国际影响 26

导读：先前关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文献大部分都是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最近，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欧央行信贷放宽的影响。本文对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欧央行货币政策国际影响的探讨进行了部分文献梳理。

货币政策三元悖论与金融稳定三难困境 29

导读：三元悖论是指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固定的汇率制度不能同时存在。但在金融一体化的世界，在资本自由流动下，即便是浮动的汇率制度也很难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金融三难困境是指，国际金融一体化、金融稳定和国家对金融的责任不能同时存在。也即是说，在完全开放的经济体，资本市场可以进行跨境交易，即便是灵活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审慎政策也会很难完全有效。宏观经济稳定的实现不仅需要全球条件以及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也需要各国之间的监管机构进行多边合作。

良好的政策始于良好的分析 32

导读：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内阁所施行的各项政策时常遭到美国各界的非议，这其中也包括华盛顿的政策分析界人士。CSIS 的资深经济政策研究人士 Matthew P. Goodman 就撰文指出，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其自身指定的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贸易赤字的目标南辕北辙。特朗普政府有必要加强对专业分析人士意见的重视程度，从而实现其自身确立的政策目标。

战略观察

是时候放下对朝鲜的幻想了 35

导读：7月4日，朝鲜宣布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意味着，就理论上而言，朝鲜已经具备打击美国大陆的能力。作者认为，美国政府是时候采取实际行动来改变现状。首先，美国必须丢弃认为中国、美国的亚洲盟友、合理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和军事手段可以解决朝鲜问题的四种幻想。最后，作者建议美国综合采用威慑、隐蔽行动、导弹防御，经济压力和信息战等方式来管控朝鲜问题。

俄罗斯、美国与中东 38

导读：中东事务在俄美两国领导人的议程中占据着重要分量，想要与俄罗斯达成战略合作，就必须先明确俄罗斯在此的目标和战略。与仅追求经济利益的中国不同，俄罗斯在中东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安全领域。其中东战略包含三个部分：第一是挑战中东政府普遍的亲西方的天性，第二是确保中东的民众革命不会激发俄罗斯本国及其盟友国家公民的效仿，第三是不遗余力地去维护自身“狭隘”的安全。作者认为，美俄两国在策略目标上存在重叠部分，但是双方在战略目标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

本期智库介绍 41

东盟的全球吸引力在上升

[ALICIA GARCÍA-HERRERO](#) / 文 安婧宜 /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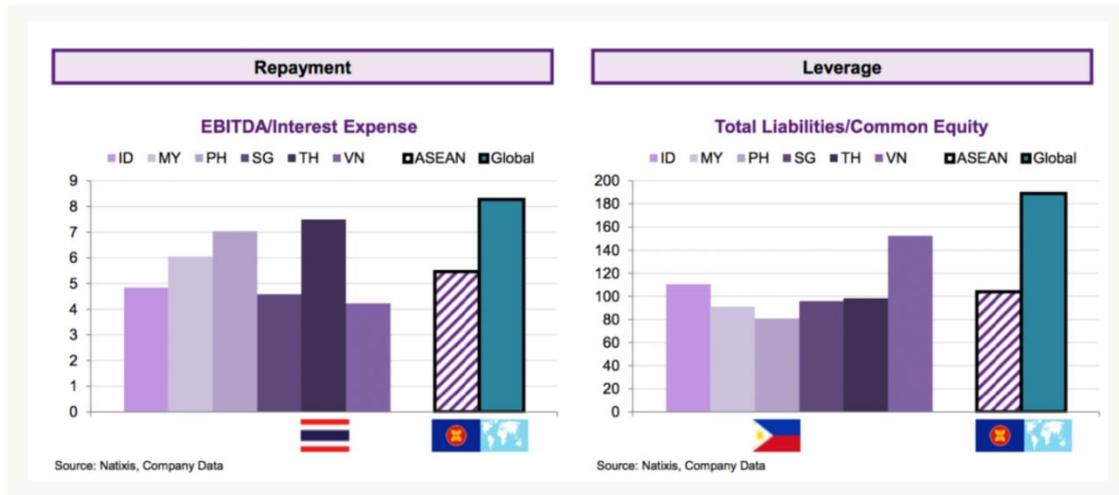
导读：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债向来被看作是对全球经济的威胁因素。事实上，这一论断对于一些大的新兴经济体来说这可能是正确的，如中国。但是，对于中国的邻国东盟（ASEAN）来说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由于低杠杆率及高增长率，东盟国家公司在全球的吸引力不断上升。编译如下：

东盟国家对投资者吸引力的上升有几个原因，如积极的人口政策和相对较大的 GDP 规模。从人口来看，如果东盟是一个经济体，它就会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场。另外，东盟的劳动力人口相对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地区来说在显著增加。这意味着东盟经济体在长期内会从中产阶级的崛起中得到比中国更多的利益。

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东盟公司与中国公司相比发债较少。确实，东盟国家在诸多方面与中国类似，但是从政府参与度到经济结构来说，东盟公司却与中国公司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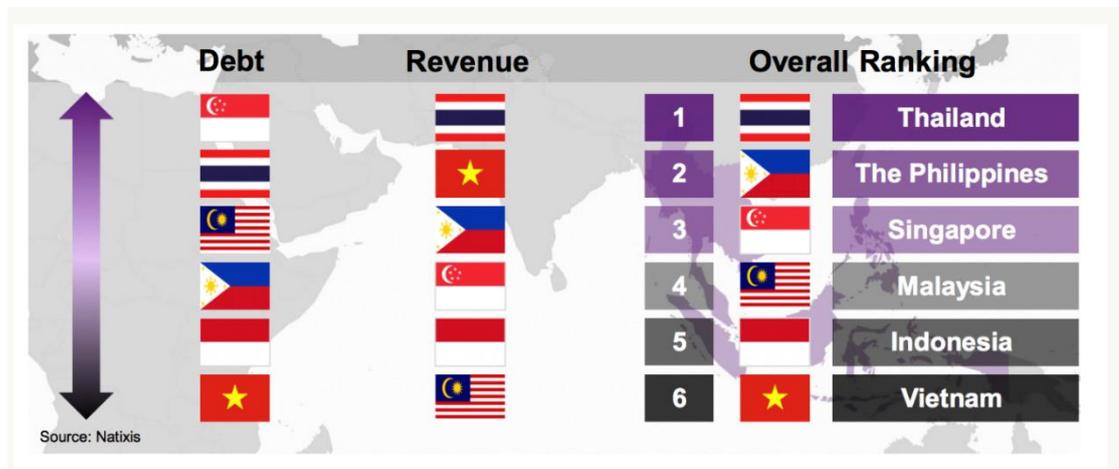
除新加坡以外，东盟地区整体会被本地区的金融系统和杠杆率影响，但是在人口众多的情况下，东盟国家国内需求普遍旺盛。同时，东盟经济体不断被外国的经济情况影响，因为它们都在贸易与资本流动方面相当开放。两个因素会对行业与国家产生影响，其一为外部因素，包括外部产品需求和商品价格，甚至是美国联邦政策；其二为国内需求，每个东盟国家的实体经济和信贷循环的情况都不尽相同。

从发债角度，与中国相比，甚至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东盟公司的杠杆率仍然很低。从资产负债率来看，东盟六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平均发债水平只有 100%（中国为 177%，世界其它国家为 176%）。东盟国家的发债结构也更加稳定，只有 56%为短期债券（一年以内的发债），而这一数字在中国为 68%。



东盟公司的盈利率也呈现出积极态势。它们的利润率比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更高。较低的发债率和稳健的盈利增长意味着东盟公司有能力强应对外部冲击。

如果将发债与盈利水平结合起来看，泰国的公司最为稳健，而越南公司则位居最后。从总水平来看，由于谨慎的负债管理和不断增长的营业收入，泰国公司在应对冲击方面表现出众。



从资本支出来看，东盟国家的情况相对多样。我们既可观察到投资增长，又可以看到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投资的削减，尤其是在那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果要在中国和欧盟国家的不同点中找到相同点，我们会发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税率对它们经济的增长都产生了正面影响。

总体来看东盟公司发展稳健

东盟国家的多样化也意味着一些国家的金融风险会更高。越南的资本支出高速增长，其经济情况在东盟国家中是最糟糕的，这归咎于越南公司偿债能力较弱、

杠杆率较高且对依赖于短期资本。这些公司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短期盈利项目与中期增长率更高的项目间权衡。

尽管拥有很高的利率，东盟国家公司的总体发展依然是稳健的。鉴于金融稳定性问题得到了控制，这一发展模式是值得借鉴的。

、

本文原题为“ASEAN against the world: strength in the numbers”。本文作者 Alicia García-Herrero 是 BRUEGEL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大国联姻：出现新的北京-莫斯科轴心了吗？

Peter Rutland/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随着美国领导层陷入混乱，中国和俄罗斯将抢占全球领导的主动权。这两个国家有相似的政治观点、不断加强的军事合作和重叠的经济利益，但过去十年两国关系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经济发展使两国渐行渐远。两国的联姻是否可能？编译如下：

随着美国领导层陷入混乱，中国和俄罗斯将抢占全球领导的主动权。这两个国家存在一些分歧，也有人认为过去十年中两国关系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就已经停滞了，并且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增长速度。如今，俄罗斯疏远美国和欧盟，却愿意在逐渐强大的中国面前收起它的骄傲。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中国主席习近平已会晤20多次。四月，普京宣称，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汉堡召开的G20峰会之前，两人曾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议，确认了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拥有共同立场。

朝鲜问题就是这样的例子。7月4日从朝鲜平壤发射的远程导弹引起了人们对于安全威胁的广泛关注。中国和俄罗斯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对金正恩（Kim Jong Un）施压的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都提议朝鲜暂停导弹试验，一致希望化解朝鲜危机以使美国减少在东北亚的军事部署。两国都强烈反对美国最近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THAAD）。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伦宁（Dmitry Trenin）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有着“共同的世界观”。这两个国家都想摧毁美国对国际金融系统的控制，并且反对美国运用军事干预等手段来推动政权更迭（如伊拉克战争、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及阿拉伯之春等）。

俄罗斯和中国也在不断加强军事合作。俄罗斯海军舰艇曾在南中国海与人民解放军进行联合演习，目前，由三艘船组成的中国小型舰队也正驶向波罗的海参加与俄罗斯的联合演习。2006年，莫斯科暂停向北京出售武器，但在2011年，俄罗斯又恢复了对中国的先进武器销售，如S-400防空系统等。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称，这可能会减弱美国在与中国发生海上冲突时原有的空中优势。

除政治观点趋同外，莫斯科和北京还有经济利益的重叠。中国需要大量的能源，而俄罗斯也正希望摆脱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方面对欧洲的依赖。2013年以来，为获取发展贷款，普京开始允许中国人获得俄罗斯能源项目的股份。

普京签署了中国的“一带一路”（OBOR）项目。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论坛上，普京获得第二个发言的殊荣，仅次于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项目涉及1万亿美元的投资，旨在建立横穿中亚、并在南部经过巴基斯坦与缅甸的交通基础设施，外加一条通过东南亚扩展港口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项目可以加速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出口，并促进对产能过剩的中国钢铁企业和机器制造厂的需求。“一带一路”项目也旨在开发落后于沿海地区的中国西部省份。

接受“一带一路”项目是普京的重大让步。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对中亚的经济影响显然更大。中国已建成了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输送到中国的管道；而在此之前，这些能源都往北输向俄罗斯。此外，“一带一路”的逻辑与普京建立欧亚经济联盟（EEU）——一个能为俄罗斯商品提供受保护市场的自由贸易区的计划背道而驰。到目前为止，只有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亚美尼亚加入了欧亚经济联盟。在北京的“一带一路”论坛上，普京同意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合并，但这是否可行还有待观察。

尽管从莫斯科和北京传出了许多正面的信号，但仍有理由怀疑俄罗斯-中国的联姻。虽然双方声称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但实际上两国间的关系非常不对称。中国的经济体量是俄罗斯的9倍，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这一关系中也包含着长期的相互猜疑。俄罗斯以前是主导的一方，而现在却变成了次要合伙人。双方地位的转换令人迷惑，而且，即使外交精英们已经接受了这一变化，它仍可能引起俄罗斯国内的强烈抵制。

此外，两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轨迹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国正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而俄罗斯却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担心全球化会使俄罗斯变成欧洲和中国的原材料产地。

俄罗斯积极探寻多边途径，希望能通过建立如金砖四国集团（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样的联盟来约束美国的力量。尽管是金砖四国的一员，但中国似乎对与美国一起建立两极秩序更感兴趣。而且，美国占到中国出口的15%，与俄罗斯相比，美国与中国在经济方面更加利害攸关。

2016年，俄罗斯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了中国石油的主要来源国，但只提供了中国20%的进口。而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仅仅占到俄罗斯贸易的12%。2016年，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长到660亿美元，但在油价还未下跌、俄罗斯经济还未进入衰退前，中俄贸易额曾在2012年达到880亿美元的巅峰。直到现在，中国对俄罗斯的部分出口商品（如小麦和牲畜）仍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中国已在一些俄罗斯的能源项目上投入巨资——贷款 250 亿美元用于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运输管道的建设，以及给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投资 120 亿美元并取得其 30%的股权。但尽管如此，俄罗斯只占到中国海外投资总额的 1%。

从文化层面看，中俄两国人民之间没有深厚的友谊。年长的俄罗斯人可能对共同的共产主义过去有些怀念，但年轻的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却没什么兴趣。2015 的一项调查发现，79%的俄罗斯人对中国持积极的态度，但只有 51%的中国人对俄罗斯抱有好感。虽然在官方立场中，中国与俄罗斯的 4000 公里边界没有争议，但流行的历史书仍指出清朝向俄罗斯割让 60 万平方公里土地是基于 19 世纪的“不平等条约”。

尽管中俄两国的政治领导人承诺友谊永恒，但经济的发展正使中国与俄罗斯渐行渐远。不过，中俄的联姻仍然是可能的，因为特朗普总统在韩国或南中国海的攻击性行动可以把两国联系在一起，共同和美国进行军事对峙。

本文原题为“The power couple: is there a new Beijing-Moscow axis?”。本文作者是 Peter Rutland，他是卫斯理安大学的教授和新加坡国际研究学院的高级客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尚未准备好领导全球化

Caroline Freund /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美国放弃了其在全球化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却准确理解了自由贸易的益处，最具条件来领导全球化。但中国需调整国企改革方案，解决其国内改革不力的问题，成为全球化领导者做好准备。具体编译如下：

由于特朗普政府放弃了美国在全球化的领导地位，中国具备充分的条件来接替该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在某些层面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时候提高中国在制定国际规则上的影响力了。

李克强总理似乎已经做好了担起这一重任的准备。他在新领军者年会上的讲话准确阐述了自由贸易的益处，并呼吁加强国际准则。同时，中国很可能与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其他国家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从降低运输成本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个贸易协定。由于关税已经降低，运输成本成为限制贸易的主要环节。解决好这一问题有助于将孤立分离的国家整合到全球经济中，创造全球化的新浪潮。

为了达到国际化的战略构想，中国需在国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诚然，自从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中国已经在市场化经济方面有了巨大进步。中国的已不再有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2016 年的经常账户盈余占 GDP 的比重不到 2%。民营企业 and 外商企业的经常账户占出口的 80% 以上，比加入 WTO 之前提高了 50 个百分点。

但是，近年来中国的改革步伐趋缓甚至出现倒退。国企改革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因此虽然企业数量减少但行业份额并未改变。2006 年，全球大型企业 1000 强中，仅有 41 家中国企业，而 2014 年增长为 136 家，其中 70% 为国有企业。这种超大型国企的战略无论是对经济增长还是全球贸易都毫无帮助。

在某些行业，中国国有企业已成为出口强势集团，并扰乱了国际市场。以钢铁行业为例，2004 年，中国还是钢铁进口国，其产量却在 2005 年前后经历了两位数的激增，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四家最大的钢铁企业均为国有企业。

与钢铁行业类似，土木工程和建筑行业也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繁荣而得到发展。该行业中，全球最大的四家企业均为中国国有企业。由于中国的建筑业发展

放缓，这些企业开始开拓国际市场，引起了国外竞争者的恐慌。有人担心“一带一路”倡议的真实目的是出口过剩产能。

国企改革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在中国，国企融资比民营企业容易。如果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能够融到更多资本，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更加迅速。研究显示，中国在 1990 年代-2000 年代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此外，大型国有企业还威胁全球贸易体系。民营企业面临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竞争是不公平的。一般来讲，国有企业应更关注就业和收入，而不是盈利，其预算约束也比民营企业宽松。这些超大型国有企业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外对中国贸易的强烈抵制。

通过倒闭或私有化等方式进行国企改革，将有助于中国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并向世界证明中国正努力成为全球化领导者。

美国总统关于贸易的大部分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即中国在钢铁等一些行业的竞争是不公平的。不过，中国支持自由贸易的说法以及投资全球基础设施的做法值得赞赏。中国需要修改市场化改革方案，从而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并缓解全球经济体系的压力。

本文原题为“Why China isn't ready yet to lead globalization”。本文作者 Caroline Freund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她曾是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领域的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资本积累与收入不平等（1978-2015）

Thomas Piketty, Li Yang, Gabriel Zucman /文 杨茜/编译

导读：1978年至2015年，中国从一个贫穷的欠发达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但是，在这个时期内，我们对其国内收入和财富分配如何变化了解相对较少。本文对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富水平和结构进行了第一次系统估计。国家财富收入比例由1978年的350%上升到2015年的700%，主要是由于私人财富的增加。编译如下：

1978年至2015年间，中国从一个贫穷的欠发达国家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新兴经济体。尽管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1978年不到3%增加到2015年约20%（图1）。根据官方统计，1978年至2015年，每个成年人的实际国民收入增长了八倍以上。1978年，每个成年人的平均国民收入约为每月120欧元（以2015年欧元为单位），2015年每月超过1,000欧元（图2）。

Figure 1 China's share in world population and GDP, 1978-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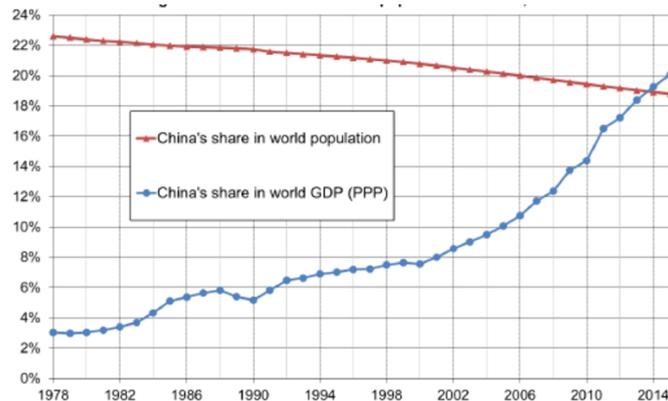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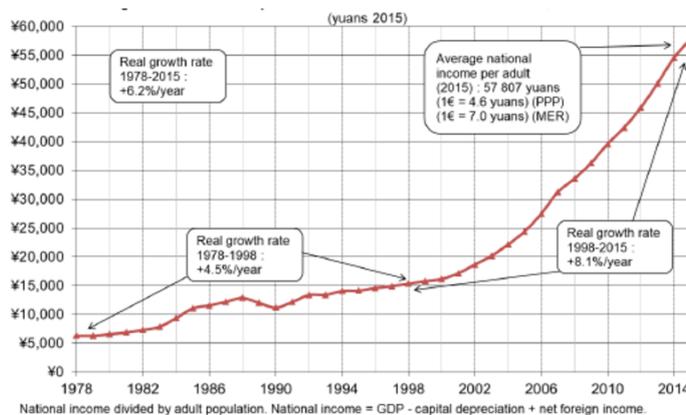


Figure 2 The rise of per adult real national income in China, 1978-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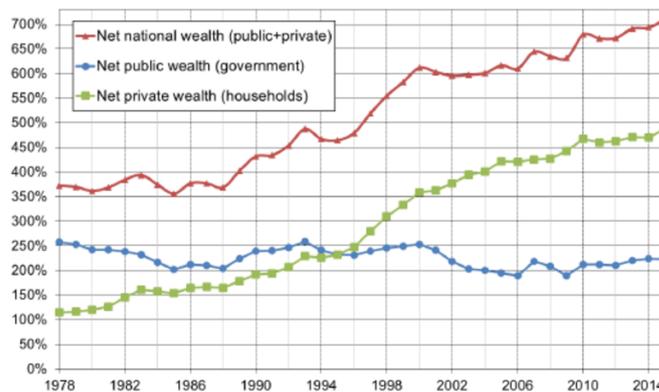
Note: National income divided by adult population. National income = capital depreciation + net foreign income.

然而，我们对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在这一关键时期如何变化知之甚少。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不同的收入和财富群体从中国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增长中受益的程度没有一致的估计。用于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家庭调查（例如 Piketty 和 Qian，2009）有大量统计上的漏报，特别是在高收入家庭，并且与通常用于衡量宏观增长的数据来源不一致（即国民账户）。这个议题对中国及其未来发展道路，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 and 全球化的社会可持续性都很重要。

财富积累（1978-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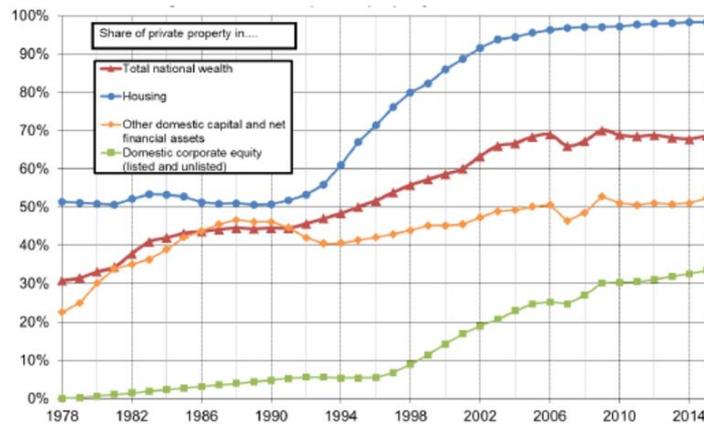
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结合官方和非官方（包括对中国资产负债表的独立估算）对市场改革进程以来中国国家财富水平和结构的第一次系统估计，发现中国国家财富收入比率从 1978 年的 350% 上升到 2015 年的 700%。这个增长主要是由于私人财富的增加，从同期的 115% 增加到国民收入的 487%（图 3）。

Figure 3 Public versus private property in China, 1978-2015 (% national income)



公共财产在国家财富中的份额从 1978 年约 70% 下降到 2015 年约 30%。现在 95% 以上的住房已经由私人家庭拥有，而 1978 年为约 50%。中国企业仍然主要是公有的：接近 60% 的中国股票属于政府（自 2009 年以来这一数据小幅反弹，其中私人所有者为 30%，外国人为 10%）。这一比例低于美国，远小于欧洲（图 4）。

Figure 4 The rise of private property in China, 1978-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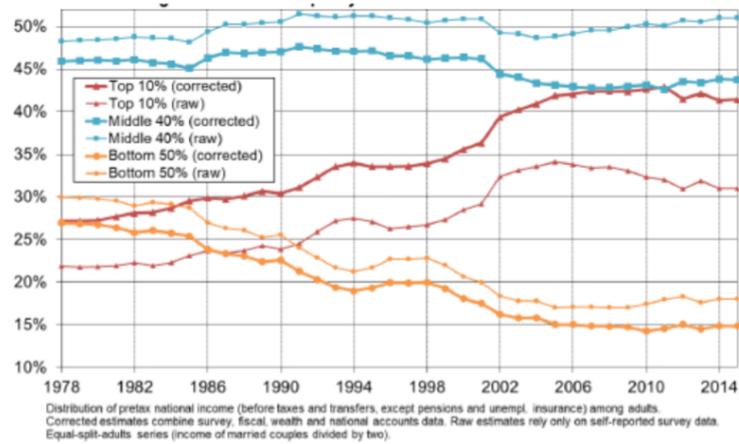
总的来说，1978-2015年，中国在私有财产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其财产制度仍然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有明显差异。中国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它应该被视为包括强大公有制组成部分的混合经济。实际上，今天中国公共财产的份额（30%）高于西方二战后的二十年混合经济体制下的比例（15%-25%左右）。今天，西方国家（公共债务超过公共资产的美国，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公共财产在国家财富中的份额已经下降到0%甚至不到0%，而中国公共财产在国家财富中的份额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似乎有所增加。

收入不平等（1978 - 2015年）

将最近公布的高收入个人税收统计与家庭调查和国民账户数据相结合，我们可以进行新的收入差距估计（Piketty等，2017）。这是首例尝试使用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数据来纠正中国的不平等统计。中国自1980年以来实行了所得税制度，但直到最近还没有详细的所得税数据。2006年，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开始公布高收入群体的总数及其收入（即每年个人应纳税收入高于人民币12万元，相当于11,988欧元）。

由于数据有限，我们可能会低估不平等程度。我们估计的最高收入份额应被视为下限。然而这个下限已经比基于官方调查的估计大得多。近年来，我们发现前10%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1%左右（而不是调查显示的31%），而前1%的收入约占国民总收入的14%（而不是调查提出的7%）。根据我们的估计，1978年至2015年，前10%的高收入人群比例从27%上升到41%，而后50%的低收入者份额从27%下降到15%。城乡收入差距有所增加，同时中国城市和乡村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明显上升（图5）。

Figure 5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Corrected versus raw estimates



总而言之，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低于欧洲平均水平，更接近在倡导平等主义的北欧国家观察到的平均水平，但现在已经达到了几乎与美国相当的水平。中国后 50% 的低收入者在国民收入中占 15%，而美国则为 12%，法国为 22%。而前 1% 的高收入者约占国民收入的 15%，而美国为 20%，法国为 10%（图 6a 和 6b）。

Figure 6a Bottom 50% versus top 1% income share: China versus 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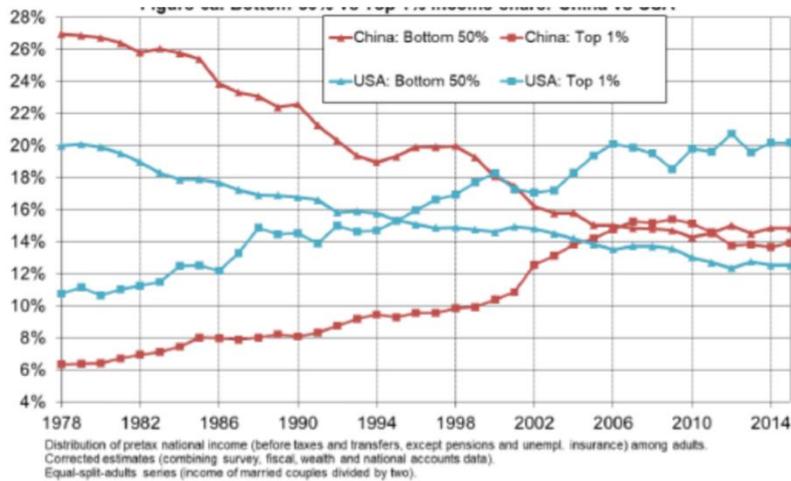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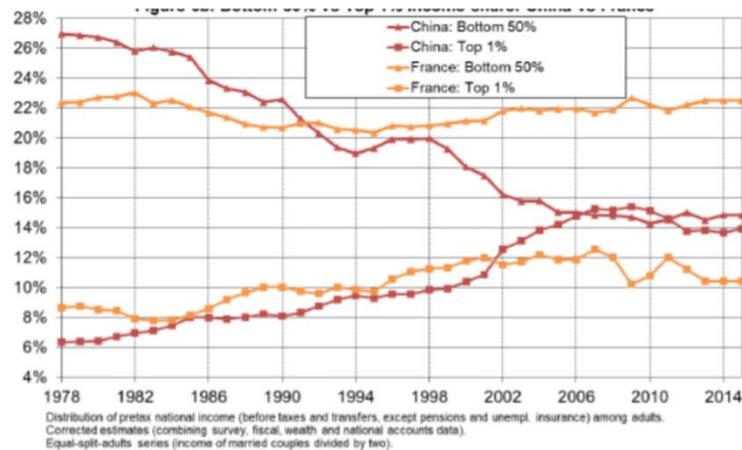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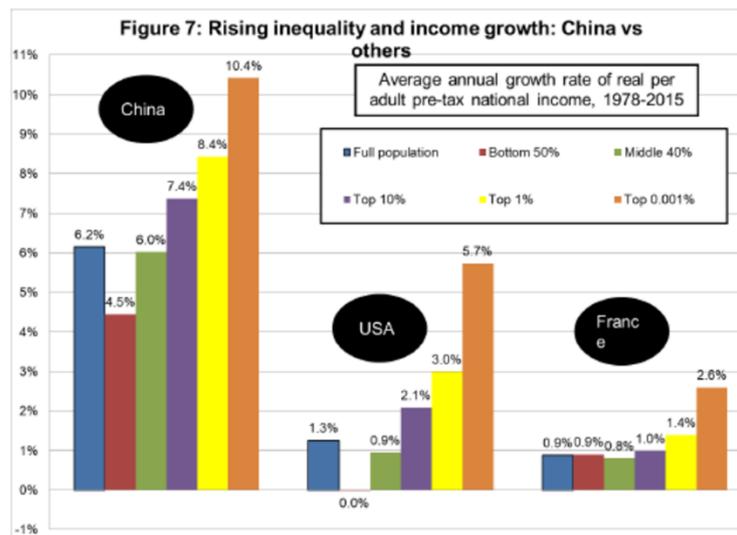


Figure 6b Bottom 50% versus top 1% income share: China versus France



比较中国，美国和法国在 1978 - 2015 年间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成人税前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如图 7 所示): 前 1% 的高收入群体增长率在中国为 8.4%，美国为 3.0%，法国为 1.4%。中国和美国后 50% 的群体年均增长率分别显著低于 4.5% 和 0%，而法国则为 0.9%。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似乎比美国更加有利于平等，但与欧洲国家相比仍有欠缺。

Figure 7 Rising inequality and income growth: China versus others



本文原题为“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本文作者 Thomas Piketty 是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Li Yang 为世界银行顾问, Gabriel Zucman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贸易与监管合作

Kim Jensen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近几十年来，国际贸易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随着商品和服务在各国间的频繁流动，国际间监管合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了出来。今年3月，CIGI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召开了专题讨论会，就国际贸易与监管合作问题进行讨论，本文是此次会议的纪要。全文如下：

今年3月13号，国际创新治理中心（CIGI）与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了一次圆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共同商讨了全球价值链中的监管合作问题。本次会议不仅关注近年来国际监管合作的经验和教训，也总结了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学术成果。通过这次会议，与会专家不仅制定了未来的研究议程，也向各国监管当局提出了恰当的政策建议。

这次会议是在一系列令人担忧的时事背景下召开的，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与会专家还是对国际监管合作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会议集中讨论的事件包括英国脱欧和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与会专家高度关心，这些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英美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风向标。一些人认为，尽管关于这两件事背后的政治动因和日后走向学界还有许多讨论，但其对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监管合作的潜在威胁，是难以令人忽视的。与英国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拿大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促进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计划，这项计划有望通过相应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使得加拿大各个阶层从中受益。

在反全球化运动势头日益高涨的今天，我们很可能目睹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势头遭遇挫折。然而，本次会议的与会专家一致同意：即便是在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下，积极推动全球监管合作也是必要且有益的。尽管反全球化的声音甚嚣尘上，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世界各国，削减贸易壁垒的看法依然是主流的，而贸易壁垒恰恰是目前阻碍国际监管合作的最主要的因素。与会专家交流了一些近年来成功的国际监管合作案例，这些成功的案例激励我们，尽管困难重重，但成功的国际监管合作的确能够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国际贸易也的确能够切实改善各国人民福利。

举例来说，本次会议的与会各方讨论的国际监管合作实例包括由加拿大-美国监管合作委员会建立的“一般审查材料电子递交通道”（Common Electronic Submission Gateway, CESG）。通过对这一成功案例的讨论，与会各方得以具体地就国际监管合作所带来的好处和不足进行了讨论，专家们也各自提出了多个问题及评论。其中一些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这些问题包括：

- 对于双边或多边监管当局，应该采用哪种监管原则作为统一标准；

- 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国际监管合作中受益；
- 如何加强向社会公众的宣传，从而普及国际监管合作将切实造福参与合作的各国人民这一理念。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与会专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相信这也为未来其他领域的国际监管合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整场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认同：为了进一步推动国际监管合作，各国必须携手起来，共同克服现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除此之外，大家也一致认为，国际监管合作应当促进，而不是减损所有相关方的福利水平。考虑到目前普遍存在于社会公众的反全球化情绪，我们必须谨慎和恰当地推进国际监管合作的进程，既要符合各国国内的监管准则和社会价值，也要切实促进各国普通公民的福利。此外，与会专家还认为，未来召开的类似讨论会议也有必要邀请监管当局的代表，从而使得学术界代表能够与政策界人士加强沟通交流，并使得讨论成果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与会各方认为，在今后我们将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中，最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社会公众对全球化、国际贸易和全球监管合作的提防及反感情绪。除此之外，与会专家认为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还包括：

- 在各国国内推进立法改革，从而使得各国现存的立法体系与国际监管合作的要求相适应；
- 增进社会及企业界对国际监管合作的信心；
- 寻找最为适合开展国际监管合作试点的行业，率先进行改革。

在今后的会议中，CIGI 和世界银行会继续组织专家进行讨论，从而在不违背各国监管准则和社会价值，并切实促进各国公民福利的前提下，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国际监管合作进程。

本文原题为“International trade and regulatory cooper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本文作者 Kim Jensen 是国际创新治理中心（CIGI）的文字助理。原文于 2017 年 8 月发表在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利率提升会导致财政危机吗？

Olivier J. Blanchard 和 Jeromin Zettelmeyer / 文 谢晨月 / 编译

导读：作者认为当前全球经济虽然在复苏，但面临四大风险：（1）公共债务高企，低增长；（2）生产率下降；（3）利率升高；（4）发达经济体的民粹运动对宏观经济政策造成影响。文章认为债务高企，利率不断上升，以及低增长也许会给意大利和其它国家带来问题，但该问题是可控的。只有当这些问题遇到民粹主义时，才会真正的爆发危机。编译如下：

过去几个季度，全球经济乐观复苏。这是自 2010 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第一次同时复苏。如何管理应对这一复苏？刺激政策是否应该退出或者何时退出？这都给政策制定者带来挑战。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全球经济还面临着如下四个风险：第一，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全球低增长，很多发达经济体包括 5 个 G7 国家的公共债务都居高不下；第二，劳动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一直在下降，未来是否会提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利率未来会上升，但上升的幅度和节奏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第四，很多发达国家有很强的民粹主义倾向，这会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接下来利率大幅度上升，低增长，高债务以及民粹主义压力可能会引发财政危机。

上述的风险是否会导致财政危机，有两点原因可以使我们不必过于担忧。

第一，大多数政府有时间去适应上升的利率，这是由于利率上升发幅度会比较慢，更重要的是由于债务的期限结构。这决定了利率的增加以多快的速度转变为政府的利息支付。很多国家利用长期的低利率来延长债务的期限，给予政府更多的时间进行财政整顿。

第二，利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增长本身的提高。很难想像由于经济复苏带来的利率上升会导致债务危机。而且，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复苏也许并不能改善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也不会影响长期实际利率。

当然一个国家持续的借贷，而经济复苏不能持续，或者经济增长不能抵消新增债务压力，上述的判断就不成立。如果债务的可持续性恶化，投资者会失去信心，风险溢价急速上升。极端情况就会爆发债务危机或者货币危机。

日本

日本债务一直居高不下。基本赤字/GDP 将近 4%，总债务/GDP 超过 200%，净债务/GDP 超过 120%。日本失业率较低，未来的潜在增速很低，高增长的愿景很渺茫。但日本政府债券的利率是最低的。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稳定的储蓄以及本国居民对本土资产的偏爱而持有日本政府债券。但到 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债券的发行会远远超过需求，该缺口需要外国投资者来购买。国外投资者

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但在目前的日本国债收益率曲线上并没有体现。为什么？因为投资者认为日本政府会找到逐渐消除基本赤字的方法。

如果投资者突然怀疑并要求较高的风险溢价，也就是说不再相信政府会稳定债务，或者无法进行财政整顿。这确实会给日本债券带来较大的抛售压力。

意大利

相比日本，意大利更容易爆发债务危机。意大利长时间的低增长对债务影响不大的原因是整个欧元区的增长和通胀都比较低。但是，当前欧元区的复苏不可避免的带来利率的上升。如果意大利的增长不能赶上欧元区的增速，利率的抬升会加大其债务压力。而且，意大利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输入通胀来化解债务，这会提升意大利债券的风险溢价以及违约的概率。

但事实上，意大利的情形并没有那么让人担忧。原因有二：第一，意大利的增长会逐渐赶上欧元区整体的平均水平。随着意大利银行业越发健康，意大利的增长前景看好；第二，即便投资者失去信心，最差的情形是失去市场进入权。欧洲稳定机制（ESM）联合 IMF 会对意大利进行援助谈判。当然这些分析都是建立在合作型的意大利政府之上，在接下来的几年，意大利政府能够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整顿。考虑到未来意大利的选举，这一点似乎并不能保证。

债务高企，利率不断上升，以及低增长也许会给意大利和其它国家带来问题，但该问题是可控的。只有当这些问题遇到民粹主义时，才会真正的爆发危机。

本文原题为“Will rising interest rates lead to fiscal crises?”。本文作者 Olivier J. Blanchard 和 Jeromin Zettelmeyer 都是 PIIE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联储需要制定规则以避免金融动荡

James A. Dorn / 文 史明睿 / 编译

导读：在纯法币时代里，如何维持币值稳定，保证金融市场稳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本文认为，美联储应制定基于特定规则的货币制度而非继续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全文如下：

在纯法币时代里，美元和其他主要币种均不能兑换成硬通货（如黄金、白银等），虽然美联储按要求应保持美元币值稳定及提高社会就业率，但一直无法达到上述两个目的，直到 1913 年《联邦储备法》创立了基于确定规则之上的货币政策。

事实上，自美联储成立以来，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了 95%。并且，在货币不稳定时期，就业率会持续下降。这种衰退曾出现在大萧条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初美联储就曾允许美国货币供应量下降近 30%，2008 年金融危机只是美联储新的失败而已。

一些专家认为，包含超低利率、量化宽松、信贷配给和前瞻性指导等形式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有助于结束大衰退，恢复真正的经济增长。然而，这是存在争议的。在任何情况下，美联储都不能永久性地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亲市场政策，减少繁琐的规章制度，降低边际税率，保障财产权利。

由于缺乏可信的货币规则，美联储的政策是无法预测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削弱了私人投资，减缓了经济增长，并降低了未来财富。

美联储主席耶伦坚决反对让美联储“只遵循一个简单的数学规则，而不考虑许多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基于规则的货币制度不一定要与“简单的数学规则”相联系。关键在于制定一项遵守“美国宪法”第 1 条第 8 款的规则，即向国会（且只有国会）提供“制造货币及规范其价值”的权力

在宪政共和国中，美联储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独立的，它必须服从法治，即政策制定者必须对货币和金融稳定负责。最好的办法是在不同的货币规则中做出选择，可能的选择包括商品标准、需求规则（例如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目标）或旨在控制某些货币总量的增长，以符合实际的经济增长的数量规则。

美联储不应被允许操纵利率，利率是影响资产价格和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利率应该由市场力量来决定（例如，消费者对当前和未来消费的偏好，以及影响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因素）。在基于规则的制度下，不确定性将减少，投资者将增大投资，并对投资决策有更大信心。

众议院通过 2017 年财政选择法案是一个信号，表明越来越多的立法者不仅关心“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问题，而且还需要通过要求审计等方式加强对美联储的控制，敦促美联储遵守货币政策。

此外，他们还支持一个“百周年货币委员会”审查美联储的表现，并探索替代的货币制度，以提供稳健的货币，实现金融稳定。

Randall Quarles（2005 年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可能将被任命为美联储董事会副主席，他将重新关注有关于货币规则的情况，而不是只关注纯粹的自由裁量权。Quarles 认为，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增加了投机，抬高了资产价格。他表示支持“货币政策规则，如泰勒规则”，并称货币规则将使利率正常化，并降低大银行及小机构承担风险的动机。

美联储最近的货币政策报告反映出许多美联储官员对采用货币规则的想法：他们认为，“美国经济非常复杂，而现有这些规则并没有捕捉到复杂性。”

事实上，正是经济的复杂性使得规则更有利于货币和金融稳定，而非单纯的美联储自由裁量权。Karl Brunner，影子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在 1980 曾发表评论称，“nonactivist（基于规则的货币）制度…不能保证完全避免经济波动。但这将使我们确信，货币政策制定不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本文原题为“Fed needs rule to avert financial instability”。本文作者 James A. Dorn 是 Cato 高级研究员及 Cato 杂志编辑。原文于 2017 年 7 月发表在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央行货币政策的国际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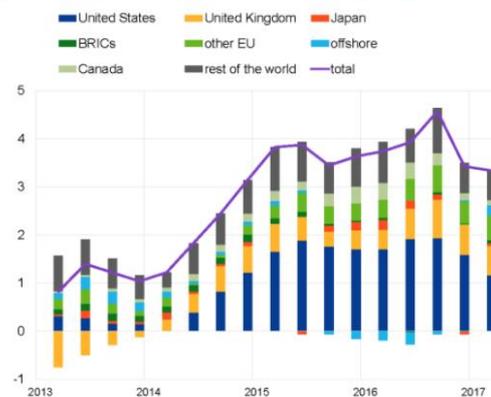
Silvia Merler /文 杨茜/编译

导读: 先前关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文献大部分都是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最近, 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欧央行信贷放宽的影响。本文对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欧央行货币政策国际影响的探讨进行了部分文献梳理。编译如下:

欧央行执行委员 Benoit Coeuré 在最近的演讲中讨论了欧洲央行资产购买计划的国际影响。有关数据显示, 欧央行宣布推出信贷宽松政策后, 欧元区资本流动从 2014 年中期从净流入转向净流出。资产购买计划通过资本流动和相对资产价格变动显示出对其他国家有溢出效应。这些资本流动没有导致重大的汇率波动。相反, 汇率似乎对前瞻性的利差反应灵敏。资产购买计划以及负利率可能会通过信号和非线性效应加剧这些差异, 但它们对汇率的影响与传统政策大体上没有根本区别。

Euro area investors' security purchases focused mainly on other advanced economies

Geographical breakdown of euro area investors' net purchases of non-euro area debt securities
(as a percentage of euro area GDP, four-quarter moving averages)



Sources: ECB and Eurostat.

Notes: A positive (negative) number indicates net purchases (sales) of foreign debt securities by euro area investors. "BRICs" comprise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other EU" comprises EU Member States outside the euro area, excluding the United Kingdom. The latest observation is for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7.

非居民出售欧元区债券在某种程度上是欧央行资产购买计划的一个机械特征, 因为外国投资者持有相对较大份额的欧元区政府债券。这一特点使得欧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与日本和美国的资产购买计划结构不同。

Coeuré 提出三个主要因素解释美国和欧元区在量化宽松政策后期债务流动的差异。第一个是收益率差异: 2008 年底至 2013 年初, 10 年期美国国债和等值的德国债券在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期间产生了与当地货币大致相同的回报率, 但最近的收益率差异很大。因此, 欧央行资产购买计划中的投资组合再平衡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比美联储的更有吸引力。第二个因素是负利率。除了收益率差异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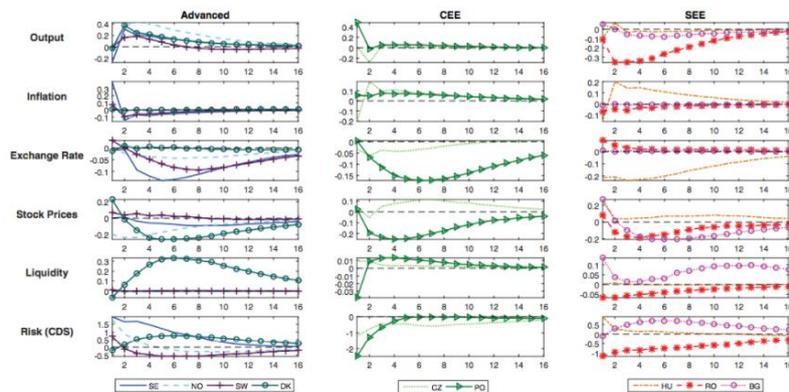
绝对收益水平对投资者而言也很重要，特别是当利率为负时。第三个是政治不确定性和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Falagiarda, McQuade 和 Tírpák (2015) 考察了欧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非欧元区的欧盟国家（捷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金融资产的溢出效应。他们发现欧央行关于债券收益率的 SMP 公告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而 OMT 和 PSPP 公告的溢出效应相当有限。他们认为，SMP 公告的溢出效应是通过投资组合再平衡和信令通道传输的。

Falagiarda, McQuade 和 Tírpák 还研究了美联储量化宽松和缩减资产购买公告的影响。他们发现中东欧国家不仅受到欧元区货币政策溢出的影响，还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然而，欧央行政策对中东欧国家的溢出效应比美联储更为显著。

Bluwstein 和 Canova (2016) 使用贝叶斯混合频率结构向量自回归技术考察了欧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不使用欧元的九个欧洲国家的影响。他们发现非常规货币政策扰动产生了国内波动；财富，风险和投资组合重新平衡渠道对国际传播至关重要，而信贷渠道并没有什么作用。外国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反应与汇率制度无关，国际溢出效应在有先进金融体系的国家更为显著。

Figure 3. Responses to a Euro-Area UMP Shock, Foreign Countries



Notes: The lines report the point-wise posterior median responses in deviations from euro-area responses. The horizontal axis reports weeks; the vertical axis reports monthly growth rates for all variables but the liquidity spread. The size of the shock is 10 percent of UMP.

Source: Bluwstein and Canova

Fratzcher, Lo Duca 和 Straub (2016) 评估了 2007-2012 年欧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包括欧元区 and 全球范围内的资产价格和投资组合。他们发现欧央行的政策提高了股价，降低了欧元区债券市场的分化。欧央行政策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股票市场有积极的影响，但对欧元区以外债券市场几

乎没有影响。欧央行的政策似乎降低了欧元区和其他二十国集团银行和主权的信用风险，而对投资组合再平衡的影响有限。

Kucharčuková, Claeys 和 Vašíček (2016) 比较了欧央行常规政策和非常规政策对欧元区和欧元区以外的六个欧盟国家（捷克共和国，丹麦，匈牙利，波兰，瑞典和英国）的宏观经济影响和溢出效应。比较是基于通过因子分析获得的整体欧元区货币状况的综合指数（MCI）。货币政策的 VAR 模型表明，欧元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播是非常不同的：价格反应更快，但产出的反应较弱并且有一定的延迟。欧元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得到了六个国家的肯定。欧央行政策在欧元区外的溢出效应：常规的货币冲击影响通货膨胀和产出，与欧元区大致相同；但非常规货币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包括汇率反应较快，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通货膨胀不受影响。

Horvath 和 Voslarova (2016) 研究了欧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三个中欧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稳定。他们使用 2008 年至 2014 年的月度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假定欧央行使用影子利率和央行资产作为非常规政策的措施，他们发现，中欧的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伴随着扩张性非常规货币政策都有暂时上升，欧央行非常规政策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比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强得多。

Ciarlone 和 Colabella (2016) 提供证据表明，欧央行资产购买计划的影响力渗透到了 CESEE（中东欧及东南欧国家），有助于他们通过不同传播渠道缓解财务状况。在短期，随着欧央行非常规政策的实施，CESEE 金融市场的一系列变量朝预期的方向变动。在长期，他们发现跨境投资组合和银行的资本受到欧央行资产购买计划的影响通过投资组合再平衡和银行流动性渠道流向 CESEE 经济体。

本文原题为“The international effects of ECB’s monetary policy”。本文作者 Silvia Merler 为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货币政策三元悖论与金融稳定三难困境

Maurice Obstfeld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三元悖论是指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固定的汇率制度不能同时存在。但在金融一体化的世界，在资本自由流动下，即便是浮动的汇率制度也很难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金融三难困境是指，国际金融一体化、金融稳定和国家对金融的责任不能同时存在。也即是说，在完全开放的经济体，资本市场可以进行跨境交易，即便是灵活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审慎政策也会很难完全有效。宏观经济稳定的实现不仅需要全球条件以及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也需要各国之间的监管机构进行多边合作。编译如下：

在过去的十年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疲软，并伴随着令人担忧的通缩压力。央行采取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以及非传统资产负债表和借贷政策来应对。美联储已经缓慢的加息来使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欧央行似乎也想转向紧缩的政策，尽管其核心CPI还低于2%的目标。面对持续的低通胀，日本央行坚定的采取非传统政策，包括将十年期国债盯住零利率。

新兴经济体充分利用灵活的汇率制度以及高额的外汇储备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事实上，这些政策在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时就已经成熟。全球金融危机时，金融不稳定从发达的北大西洋经济体开始辐射。很快，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到量化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资本快速流入，然后面临着快速流出的压力。其实，不仅美联储的紧缩政策，中国的政策变化，如汇率政策也会给全球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带来溢出效应。

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形势，全球经济体很难同步增长。但现在，我们谨慎的认为这些有迹象都在变化。在我们四月份的全球经济展望中，我们认为，随着2016年上半年消费者信心的提振，制造业PMI的上升以及投资、贸易和制造业的改善，世界经济似乎正在获得增长动能。IMF提高了全球经济展望，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3.5%，2018年是3.6%。

今天在这里，我们将宣布我们对四月份判断的修订，我们认为四月份关于全球经济重新获得动能的判断是正确的，下图是一些国家经济展望的修正。

图1 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关于经济增长预测

Figure 3: April 2017 WEO growth projections*(percent change from a year earlier)*

	 World	 Advanced Economies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Asia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ub-Saharan Africa	 Other EMEs 1/
2016	3.1	1.7	6.4	0.3	3.0	-1.0	1.4	3.9
2017	3.5	2.0	6.4	1.7	3.0	1.1	2.6	2.6
Revision from Jan. 2017	0.1	0.1	0.0	0.2	-0.1	-0.1	-0.2	-0.5
2018	3.6	2.0	6.4	2.1	3.3	2.0	3.5	3.4
Revision from Jan. 2017	0.0	0.0	0.1	0.3	0.1	-0.1	-0.2	-0.1

Sources: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7 as of July 12, 2017; and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January 2017.
1/ Other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includ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四月份的经济展望里，我们认为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前景出现分化。大多数的拉美国家，中东以及沙特阿拉伯由于大宗商品的低位，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由于气候和安全带来的担忧，经济萎靡。另一方面，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中国经济增速超过 6%，印度超过 7%，东盟五国大概在 5%。但必须指出，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低位徘徊，收入不平等以及人口结构的改变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潜在危害，而且这些挑战都是货币政策所不能解决的。

货币政策通过锚定中长期的通胀水平来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但全球金融危机表明，通胀的稳定并不能保证宏观经济稳定，还有金融稳定。全球的金融稳定需要各国之间加强国际合作，这要求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好的理解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跨境传导机制。

三元悖论与全球化

三元悖论认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只有实施灵活的汇率制度才能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在全球化的世界，即使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很难摆脱全球金融的发展。中心国家会通过总信贷流动和杠杆率对外围国家产生影响。

Dirk Schoenmaker 提出的金融三元悖论是指，国际金融一体化、金融稳定和国家对金融的责任不能同时存在。也即是说，在完全开放的经济体，资本市场可以进行跨境交易，即便是灵活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审慎政策也会很难完全有效。这就需要全球进行国际金融合作。一项政策完全发挥作用不仅仅需要考虑全球条件以及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也需要各国之间的监管机构进行多边合作。

货币政策以金融稳定为目标？

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有两个极端的观点：一个是应该使用货币政策管理金融稳定。主张在通胀低于目标时，应该加息以消除金融过剩；另一个极端观点是，对于开放经济体尤其是小型经济体，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都不能保证金融稳定。本文认为：

- 价格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前提条件，而不是顾此失彼。货币政策应该与通胀保持明确的联系，否则金融稳定沟通更容易使人困惑。

-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利率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货币政策不能完全以金融稳定为目标。

- 灵活的汇率制度不仅有助于追求国内的价格稳定，还有助于免疫国外金融冲击的影响。

- 价格稳定和灵活的汇率制度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金融稳定需要监管工具，如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来保证。

- 在开放经济体，加强多边金融合作有助于金融稳定，提高审慎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原题为“Two trilemmas for monetary policy”。本文作者 Maurice Obstfeld 是 IMF 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良好的政策始于良好的分析

Matthew P. Goodman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内阁所施行的各项政策时常遭到美国各界的非议，这其中也包括华盛顿的政策分析界人士。CSIS 的资深经济政策研究人士 Matthew P. Goodman 就撰文指出，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其自身指定的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贸易赤字的目标南辕北辙。特朗普政府有必要加强对专业分析人士意见的重视程度，从而实现其自身确立的政策目标。全文如下：

据称，某位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向财政部的员工们表示：“我们财政部，是一个高度重视严谨性与相关性的部门”。从这番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财政部是一个具有悠久研究传统的部门，其部门领导在决策时高度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然而，仅上台六个月以来，特朗普领导的内阁班子已经无数次地低估，甚至是无视严谨专业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联邦政府决策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这不仅会使得特朗普内阁自身确立的政策目标难以达成，也会在无形中有损美国的国家利益。

良好的政策始于良好的分析。如果联邦政府认为越来越高的医保保费是个严重的问题，那么他们首先应该分析这个现象的起因，搞清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并且全方面预测政府的各种干预方案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而这些工作，都理应交给专业的分析人士。

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正是分析和研究工作使得特朗普政府在执政初期避免了不少潜在的危机。在竞选时，特朗普一直宣称要在“上台第一天”就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然而，在上台后特朗普政府并没有这么做。这一切的原因，恰恰是财政部的研究人员坚持认为中国并不满足判定货币操纵国的三大标准。因此，在今年 4 月提交给国会的调查报告中，财政部才没有正式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不过，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就不那么重视专业分析人士的意见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特朗普政府对双边贸易逆差的痴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将美国巨额的赤字简单归因于贸易伙伴国的不正当竞争手段，是非常站不住脚的。特朗普政府执意如此，不仅令人日益担心贸易保护主义的死灰复燃，也会反过来伤及美国经济，使特朗普政府更难达成其自身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特朗普政府执迷于双边贸易赤字的做法，反映了他们对国际贸易体系的过时看法。事实上，如今全球的价值链体系意味着双边贸易赤字的概念已经无足轻重。大多数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实际上都是国际分工的产物。在这些货物的价值中，相当一部分都应当归属于其他国家，如越南或日本。然而，在现行的会计

体系中，这些价值全部被记为来自中国，并被进一步计算到中美贸易逆差当中。根据牛津大学经济学家的研究，如果我们使用价值链的计价方法，将商品的价值细分到不同国家头上，那么 2015 年的中美贸易逆差将降低一半以上，仅相当于当年美国 GDP 的百分之一。

此外，特朗普政府也坚信贸易壁垒是降低贸易逆差的灵丹妙药，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本质上讲，一国总的贸易赤字反映的是国内总投资与总储蓄的差额。根据彼得森研究所 Joe Gagnon 和 Fred Bergsten 的研究，美国目前贸易赤字主要的驱动因素是联邦政府自身的贸易赤字，以及别国政府对汇率的人为干预。东亚及欧元区的很多经济体长期以来都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因此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主权基金和社保基金长期以来一直在向美国投资，这才是美国持续高涨的贸易赤字的真正来源。

更糟的是，本届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是建立在有瑕疵的分析之上的。特朗普政府希望将美国的年经济增长率从目前的 2% 推高至 3%，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鉴于美国国内持续低迷的生产力增长水平，这个目标显得过于雄心勃勃。唯一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从企业、家庭和政府三方面着手，大力刺激其消费和投资。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在税务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两大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总统和财政部应该继续努力，集中精力与国会合作，通过立法手段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

同时，特朗普政府也需要制定恰当的国际经济政策，来配合其国内的经济刺激计划。试想，倘若美国的经济增速真的在刺激政策下回到了 3% 水平，而美国的内需水平又不像中国、日本、德国那样得以维持持续增长，那美国的贸易赤字只会进一步扩大。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必须着眼于说服其他大国共同在其国内开展经济刺激计划。这一切的首要目标是德国，要知道，德国的高储蓄率使得其国内的总储蓄水平大大高于投资水平。2016 年，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高达其 GDP 的 8.3%。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汉堡 G20 峰会上，特朗普本可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与默克尔共同商议这一话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过度执迷于讨论两国间的双边贸易问题，而没有在真正核心的国内经济政策问题上费多少功夫。这使得特朗普错失了劝说德国采取措施，以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的大好机会。

值得肯定的是，特朗普政府正确认识到了一些国家使用不合理、不公平的贸易竞争政策，并伤害到了美国企业利益的现实。举例来说，中国在农业和服务业领域对美国企业的限制、在钢铁和铝业等领域对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以及对外汇流通的政策限制都扭曲了国际贸易市场，并伤害了美国的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不应对此坐视不理。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仅仅在贸易领域

对美国的任何贸易伙伴国采取制裁，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目前贸易赤字的规模。降低贸易赤字的根本方法，是对美国国内的投资与储蓄规模进行宏观尺度的干预，这不仅涉及到美国自身的国内经济政策，也牵扯到美国政策施行的国际经济政策。

毋庸置疑，财政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研究人员和职业官僚都十分清楚这些道理。但是，如果特朗普内阁的高官队伍依然对国际贸易抱有顽固的零和思维，那么这些正确的分析就永远无法转变为正确的政策。因此，特朗普政府有必要在经济问题上多多倾听专业人士的观点，毕竟，良好的政策必然始于良好的分析。

本文原题为“Good policy starts with good analysis”。本文作者 Matthew P. Goodman 是 CSIS 的资深经济政策研究员。原文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发表在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是时候放下对朝鲜的幻想了

Richard Fontaine / 文章珏/编译

导读：7月4日，朝鲜宣布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意味着，就理论上而言，朝鲜已经具备打击美国大陆的能力。作者认为，美国政府是时候采取实际行动来改变现状。首先，美国必须丢弃认为中国、美国的亚洲盟友、合理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和军事手段可以解决朝鲜问题的四种幻想。最后，作者建议美国综合采用威慑、隐蔽行动、导弹防御，经济压力和信息战等方式来管控朝鲜问题。编译如下：

随着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已经完成了众多专家认为它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特朗普总统认为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从理论上说，平壤现在已经具备打击阿拉斯加的能力。虽然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开证实这点，但是朝鲜宣称自己已实现核弹头小型化。无论其核计划的确切地位如何，平壤很快就能用核导弹袭击美国大陆。因此，现在是时候美国政府该做出回应了。

美国的对朝政策应注入更多的现实主义元素。美国经常热衷于采取不切实际的手段去追求富有吸引力但难以实现的目标。如今，美国应凭借自身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实际优势实力，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来回应朝鲜试射行为。同时，美国需要丢掉一些幻想。

幻想 1：中国会解决朝鲜核问题

我们可以相信，特朗普政府似乎终于放弃了依靠中国施压朝鲜逼迫其放弃核武器的想法。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在今年第一季度不减反增，甚至其高调宣扬的暂停对朝出口煤炭效果也并不显著。期待中国在接下去的几天接受美国对朝鲜的批评，甚至接受联合国对朝制裁，都只会是维持现状。

中国不会对朝鲜施加那种足以迫使其放弃核导弹计划的严峻经济压力。这样的压力会威胁到金家政权的稳定，且中国政府十分清楚，半岛的统一最终只可能通过韩国主导实现。失去朝鲜这个缓冲国，让美国军队驻扎在其边界，这是中国万万不能接受的。

幻想 2：美国的亚洲盟国会解决问题

在试射成功后，特朗普总统发推文称，“难以置信韩国和日本竟可以对此忍受这么久。”实际上，它们已无奈地忍受朝鲜的直接威胁几十年了。任何洲际弹道导弹将会针对美国而不是它们。

当平壤成功实现小型化目标后，它就有能力用已有的导弹装载核弹头打击日韩两国。在不具备对朝鲜造成无法接受的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下，日韩两国无法促使其放弃核计划。

幻想 3：正确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将带来改变

华盛顿的许多官员似乎仍相信，美国可以通过合理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实现朝鲜无核化目标。

善于使用武力镇压国内暴动，朝鲜只担心外界干预。威胁对美韩任何试图利用其国内不稳定的行动给予核打击，就反映了其不容压缩的安全诉求。朝鲜代表曾在二轨对话中引述卡扎菲和萨达姆的命运，两个人都放弃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开发计划，最后却都不得善终。

金家政权将核武器视为其根本安全保障。他们不会轻易卖掉核武器，也不会因经济和军事压力而放弃核武器。虽然美国政策的公开目标是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但是决策者私下里应该认识到我们的现实目标是冻结朝鲜的核导弹计划。

幻想 4：可以通过军事力量解决朝鲜问题

一些观察家仍认为存在一条可行的消除朝鲜核计划的军事路线。但是，正如许多分析家指出的那样，平壤在非军事区的边缘维持了一支火炮、火箭和生化武器库，攻击范围可到达首尔。因此，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可能会引起其向首尔、驻韩美军和日本发起报复性打击。

理论上，美国可以分两阶段采取军事行为来清除朝鲜的核导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会打击朝鲜的核导弹库，并向平壤发电报表明这场打击的有限性。华盛顿将进一步向金正恩传递信号，任何报复性行为都会导致美国对其政权实施强制性破坏打击。

这样的方式，在理论上似乎是可行的，但却存在风险。毕竟金正恩对美国试图颠覆其政权抱有近乎偏执的肯定心态。现实可能是，平壤将美国的这次打击恰好理解为其长期准备的战争的开始。

幻想外的战略行动

除了上述四种幻想，其他被广泛论及的对朝政策就是威慑。这种威慑论点以平壤的理性本质，或至少是生存本能为前提，认为朝鲜的核计划只是为了维持其政权存在，因此，朝鲜更像是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而不是现在的伊斯兰国。

而这仍未令人满意。美国并不喜欢俄罗斯的核弹对准美国，但却选择接受，是因为不存在更好的替代方案。中俄两国都明白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核打击将导致美国大规模报复行为。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增加第三个国家使人不快。然而，威慑仍将是确保朝鲜的行动只是挑衅而不是直接侵略的关键。

除了强大的威慑外，其他因素也应被考虑到对朝鲜威胁采取的更为实际的应对方式中。

美国及其盟友应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包括在韩国部署萨德，在美国完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日本部署萨德或宙斯盾系统岸上蓄电池。

美国决策者应将武力威胁公开摆在台面上，却在私下认识到使用武力的严重缺陷。同时，美国应采取网络破坏等隐蔽行动来破坏朝鲜的武器计划。美韩两国应拒绝中俄提出的“冻结对冻结”计划，即以朝鲜停止导弹试射换取美韩停止军事演习。因为军演对于未来威慑失败双方诉诸军事行动起着准备作用。

美国还应对平壤精英施加新一轮更强烈的经济制裁。美国政府之前一直碍于中美关系而避免针对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中国企业。而近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的对一批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的制裁算是开了个好头，但美国单方面还可以做的更多。

从长远来看，美国及其盟友应推动金家朝代的更换。他们应采取措施，扩大朝鲜人民的信息渠道，突出朝鲜国内的人权侵犯行为，鼓励叛逃，在幕僚里播下不信任的种子。

同时，美国决策者应注意避免假设朝鲜问题可以解决，或者绞尽脑汁去创造一个不可实现的解决方式。

此外，他们必须避免让朝鲜问题主导美国亚洲事务。毕竟朝鲜问题不是美国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唯一症结。特朗普政府应注意避免拿中俄对朝施压的承诺来换取其他重要问题的妥协，比如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综合采用威慑、隐蔽行动、导弹防御，经济压力和信息战等方式，我们可能不会解决朝鲜问题，但至少可以管控它。

本文原题为“Time to lose your illusions on North Korea”。本文作者为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总裁 Richard Fontaine。本文刊于 2017 年 7 月 7 日 CNA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俄罗斯、美国与中东

Jon B. Alterman /文 章珏/编译

导读：中东事务在俄美两国领导人的议程中占据着重要分量，想要与俄罗斯达成战略合作，就必须先明确俄罗斯在此的目标和战略。与仅追求经济利益的中国不同，俄罗斯在中东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安全领域。其中东战略包含三个部分：第一是挑战中东政府普遍的亲西方的天性，第二是确保中东的民众革命不会激发俄罗斯本国及其盟友国家公民的效仿，第三是不遗余力地去维护自身“狭隘”的安全。作者认为，美俄两国在策略目标上存在重叠部分，但是双方在战略目标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编译如下：

我们并不清楚，在本月 7 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间歇，美俄两国总统到底谈了什么，但我们知道，两国领导人谈了很多关于中东的事情。据称，特朗普对普金称道，“叙利亚有太多伤亡。我们必须解决叙利亚问题。”

在过去的五年间，俄罗斯一直在中东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在与俄罗斯达成战略合作之前，确定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目标和战略将是有益的。

将之与中国战略进行比较，我们将更容易把握俄罗斯的战略。中国在此具有重要利益，其 60% 以上的进口能源来自中东。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中国承包商拿下了当地数十亿的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经济实力不断扩大。中国在该地的目标是，在扩大经济实力的同时，避免付出昂贵的代价来增加安全实力。中国试图利用自身经济存在来补充而不是削弱美国的安全存在。因为对中国产品和技术持有广泛兴趣，中国经常受到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

与之相反，俄罗斯在中东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安全领域。俄罗斯售卖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却很少在非军事领域与当地有贸易和投资往来。它试图成为二手武器供应商，在美国拒绝时，向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售卖武器。与明确表示和美国一道行动的中国不同，俄罗斯在中东的行为似乎就是为平衡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设计的。在奥巴马政府宣称“阿萨德必须下台”后，是俄罗斯一直支撑着阿萨德政权，并向伊朗出口 S300 导弹，在叙利亚部署更为先进的 S400 导弹。

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在中东的表现仅仅只是为了反抗美国。对于恐怖主义威胁和当地专制政权巩固，俄罗斯有自己的判断。但在处理具体事务时，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俄罗斯似乎将国际关系视为一场零和游戏。那么，美国的获利就意味着俄罗斯的失利，对美国的敌意越大，就意味着对俄罗斯就越友好。

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的增长发生于美国在此已有了出色的表现之后。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在中东各处都有代理国，例如叙利亚、南也门和埃及。但在苏联

解体后，俄罗斯很难能捡起丢失的实力。到 2010 年，除了正在努力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叙利亚和伊朗，中东的每一个主权国都与美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几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始终是制造更具弹性的社会。首要目标是建立足够强大的社会以遏制共产主义，现在是抵抗恐怖主义。广阔的经济机会、开放的市场和包容性的政策都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然而，俄罗斯似乎将美国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排挤俄罗斯的方式，将政治行为看作是危险、天真的。

尽我们所能可知，俄罗斯的战略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挑战中东政府普遍的亲西方的天性。为此，俄罗斯采取两方面的手段，一方面是破坏西方形象，恶化西方意图；另一方面是煽动亲西方联盟的内部混乱（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这些联盟最初的形成原因就是遏制苏联）。

第二是确保中东的民众革命不会激发俄罗斯本国及其盟友国家公民的效仿。

第三是随着政府与恐怖主义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不遗余力地去维护自身“狭隘”的安全。俄罗斯的行动似乎旨在消除西方为促进该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所做的广泛努力。俄罗斯的行动紧紧围绕与中东各国安全机构建立紧密的双边联系这一战略，它已与叙利亚政府一道采取了一系列暴行来表明自己的决心和实力。其实，俄政府在高加索地区的反恐行动早已揭示了它偏爱的战略——即一种焦土政策。

广泛看来，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在为中东的“胜利”而不懈奋斗，力求促进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变来实现进一步稳定。相反，俄罗斯似乎渴望获得与美国同等的影响力。可以说，俄罗斯无法获胜，它做的只是在数量上不断压倒美国。但是俄罗斯可以成为一个捣乱分子，利用其有限的力量，开拓影响力，破坏别国的计划。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而言，它们投入了万亿美元，花费了大量努力来创造加入多边机制、推动广泛利益的有弹性的政府。俄罗斯狭隘的安全措施不但阻碍了西方的建设，也影响了这个地区的轨迹。

仅从策略目标考虑，俄美两国在中东的目标有很大的重叠之处。例如，俄美两国都不希望“伊斯兰国”控制叙利亚。但是从战略角度出发，两国就存在许多分歧。俄罗斯似乎不愿意击垮“伊斯兰国”，认为它的存在可使叙利亚政府的存在和俄罗斯的支持合法化。更广泛地说，俄罗斯视推动弹性社会的多边努力不仅仅是愚蠢的，还是对其稳定的一大威胁。美俄两国在中东的分歧不仅仅表现在各自关注点不同上。实际上，这种分歧是根本性的，中东的每一个迹象都在表明这点。

本文原题为“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本文作者为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全球安全和地缘政治专家，负责主持中心中东项目的 Jon B. Alterman。本文刊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 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